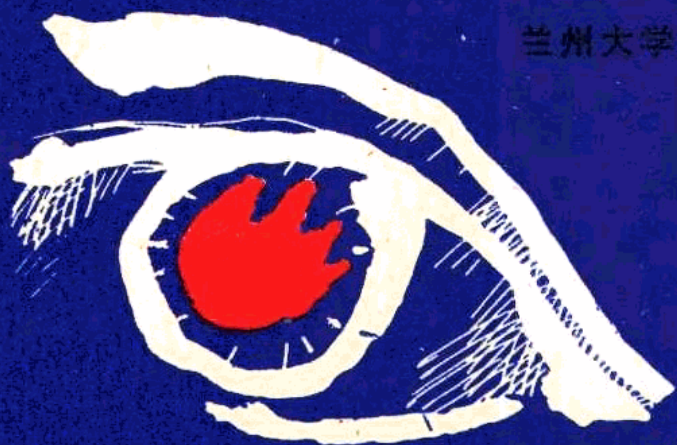


孙绿江

兰州大学出



狂热·困惑·选择

——老三届的心理历程

3.2



绪 言

“老三届”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存留下来的特定的概念。它指的是文化大革命爆发时中学的全部在校生，即六六届，六七届，六八届高中和初中毕业生。这个名词曾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过，使用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已渐渐被人们淡忘了。只有老三届自身牢牢地记得这个曾在自己头上凌驾着的特定的“桂冠”，也只有他们才真正知道这个名词所蕴涵的全部意义。

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带给老三届的曾是那么一种难以言说的战栗和狂喜。他们真诚地相信明天的太阳将会从他们手中升起，他们天真地认为红卫兵运动将会把中国改造成一个纯而又纯，绝无半点杂质的理想天国。而当他们在“史无前例”的红卫兵运动中“横扫一切”、“打倒一切”之后，却又发现他们的努力、狂热与牺牲带给祖国的只是难以想象的劫难，而不是期望中的满天彩霞。他们在失望、迷惘、痛苦、沉沦、抗争、反思之后，开始用理智而不是狂燥的目光注视人生与周围的世界的时候，如诗如梦的大好年华已成昔日云烟，他们开始步入中年。

没有哪一代人象他们这样，在这样的年龄有过这样奇特、曲折、痛苦而又基本一致的人生经历与心理历程。

他们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与生活经验，具有极强的心理承受能力与实际工作才干，再加上文革结束后对文化知识的

全面补习，他们终于走向了成熟。

他们用独特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用独特的方式去认知、去思考这个世界。他们注重实际，注重实际效果；他们敢于面对现实，他们善于面对现实。他们不再去凭空幻想，不再为自己制造的幻影而激动，他们已成为脚踏实地、认真负责、注重事业、理解人生的一代人。

在当代中国的大地上，能以自己的言行影响中国现实进程的共有四代人：开创共和国的第一代人；建国后成长起来的，在文化大革命到来之前参加工作的（包括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在校大学生）第二代人；老三届——第三代人；“八十年代的新一辈”——第四代人。

这四代人虽然经历各异，虽然对待世界的态度与思维方式不尽相同，虽然互相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他们却有着一个共同点：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每一代人都认为中国未来的历史取决于自己的努力，每一代人都认为自己肩负着继往开来的历史重任。然而，几代人之间却缺乏深刻的理解。沟通彼此的心灵，为弥合深刻的代沟尽一份微薄之力，这是写作本书的第一个目的。

现在，第一代人已基本退居二线，但仍在以自己的声望与智慧发挥着自己的影响。第二代人正年富力强，肩负着各项重任。在本世纪的最后一个10年，第三代人将逐步进入历史舞台的中央，而在21世纪的前20年将成为中国的主要执政阶层。历史的第一次选择，使他们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红卫兵，但历史必将第二次选择他们，如果他们能正确地认识自己，把握这一机遇，他们将成为左右中国的重要力量。不但各级基层组织的领导人中将有大批的老三届成员，

在中央也会有他们的身影。对21世纪中国的预测，不能忽视他们的存在。对他们心理的揭示，发现他们的优劣短长，将会有助于我们对未来中国的认识。这是写作本书的第二个目的。

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同样不能忽视老三届的存在。不管后人对他们的功过得失做何种评价，当代中国的历史已经留下了他们深深的足印。对他们的心理历程的揭示，必将有助于对当代中国的了解和研究。这是写作本书的第三个目的。

本书的重点并不在描述历史事件本身，也不在揭示历史事件的意义，而重在描述历史事件在老三届心中造成的震荡、迷茫、困惑、反思、批判，并最终走向成熟的心理历程，进而总结出他们现在独具的思维方式与人生态度。

老三届目前正处在三十八、九至四十五、六岁之间，未来的中国需要他们。让世界认识他们，让他们认识自己，重新唤起他们那潜藏在心中的理想、抱负与希望，勇敢地迎接历史的第二次选择，是本书的主题。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对整整一代人的心理历程的描述，只能择其最具代表性的群体而言。当我们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一代人的时候，我们的目光只能落在这一代人中的具有积极倾向的或具有最大影响力与代表性的群体身上。

就老三届而言，我们所描述的群体，主要依托在红卫兵→知识青年→工人→大学生→如今已开始走上各级基层组织
的领导岗位或已成为各级各类行业与部门的工作、生产骨干
这样一群人身上。不仅因为他们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基本的积极倾向，而且也因为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着这一代人的人生的基本的价值取向。因此，我们的描述自红卫兵开始（包括

文革前的中学政治思想教育，因为这是产生红卫兵的思想基础。）。同样，在与他们作对比时，我们所选择的第二代人，第四代人的群体代表，也以此为依据。

作为老三届的一员，我深感责任重大。只有奋力写作，以慰我的同时代人。

第一章 文革前的老三届

文革前的政治气候与社会环境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以此为标志，饱受奴役与压迫的、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真正站立起来了，他们真正成了这片古老土地上的主人，真正成了这个古老的国家的主人。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的宣告声，不仅鼓舞着中国人民，而且也震撼着世界。

自豪、亢奋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以空前的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事业之中，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极其伟大的胜利与辉煌的成功。

对过去受奴役受压迫的屈辱历史的清晰记忆，对眼前的伟大胜利与辉煌成功的欣喜，对自己政治地位的真正确立的自豪，使得历经苦难的中国人民由衷地感谢党，信赖党的领袖，他们满怀着自豪和自信，在党的领导下，大踏步地跨过历史的废墟，勇往直前，义无反顾。

中国人民对党和领袖的无比信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热情，成为建设新中国最可珍贵的巨大财富和最为直接的原动力。共和国的领袖欣喜地发现，并成功地运用着这一举世无双、旷世无偶的巨大财富，使年轻的共和国真正获得了一日千里的发展。但伟大的胜利和辉煌的成就却渐渐使共和

国的领袖开始急于求成，由“人的因素第一”渐渐走上了“人的因素唯一”的歧途。

“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创造力”这一精辟论断，渐渐成为可以超越物质局限和历史局限而任意创造奇迹的万能法宝。只要有了人——具有无限政治热情的人民——一切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种想法，贯穿于毛泽东的后半生。物质因素、历史因素、文化因素都渐渐退出了毛泽东的视野。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才力图超越历史的局限，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力图以此来保证、促进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和建设热情；力图以此来把人民群众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各种腐朽没落的人生意识消灭在萌芽之中；力图以此来消除敌对分子，保证党和政府的纯洁。

高度重视政治的作用，正是源于对人民群众在巨大的政治热情的推动下所创造的人间奇迹的清醒认识，正是源于对人民群众中所蕴涵的巨大的政治热情的万分珍爱。然而，这种以否认物质局限、历史局限、文化局限的方式来超越物质局限、历史局限和文化局限的做法，却使得党内的左倾错误思潮迅速泛滥、壮大起来，并使得政治运动一次比一次更为剧烈地脱离了以思想教育为主的轨道，演化为范围不断扩大的组织清理。

与此同时，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59年的苏共二十大，60年代初的国际共运大论战，以及三年困难时期国际上的“反华大合唱”等因素，也不断强化着人们的阶级斗争的意识。

年轻的共和国从它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国内反动分子的破坏和国际上敌对势力侵袭的危险，强化人们的阶级斗争

观念和政治意识，原本是必要的，每一个过来人都会承认这一点。然而，在左倾错误和教条主义的影响下，阶级斗争却渐渐被扩大化、绝对化。到了60年代中期，阶级斗争已成为中国政治的主题。不仅思想情感、工作学习、人际交往中体现着阶级斗争，就连衣食住行、花鸟虫鱼中也体现着阶级斗争了。

政治的含义就是斗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领袖的语录脱离了具体的语言环境，不受时间、地点、场合、背景、对象的限制，而被广泛地、随意地使用着。人生的目的就是斗争，“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斗争的核心便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它成了解决一切困难的最简便易行而又最见成效的灵丹妙药。阶级斗争的含义、范围与功能被无限扩大，成为政治的直接现实。任何一件小事都可以被上到阶级斗争的“纲”上来。“镜子里面照一照，无产阶级思想全跑掉”，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镜子里面就有政治，就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的动力何在呢？这就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建国的喜悦，建国后工农业生产的蓬勃发展，国力的日益昌盛，使亿万人民群众对党、对领袖产生了深切的敬爱，毫无保留地崇拜领袖的权威。他们对自己在旧中国所受的奴役、压迫和屈辱记忆犹新，对自己在解放后所获得的政治地位分外珍惜。他们唯恐党变修，国变色，唯恐再次退回到那个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去。这一切在左倾错误与教条主义的诱导下，发展、浓缩为一种强烈的特殊的政治热情。

“以思想划阶级”的做法的出现，更使得一些人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这种政治忧虑与政治热情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就使得阶级斗争获得了充足的动力，滚滚向前，不可遏制。

那么，阶级斗争的对象又是什么呢：第一便是帝、修、反——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反动分子。对帝国主义的理解基本沿用着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的科学论断，歧义较少。但对修正主义的理解则概念不清。叶剑英在《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实际上，在愈演愈烈的左倾错误与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下，也不可能对什么是修正主义作出准确的解释。因为左倾错误与教条主义错误的根源在于要求革命队伍纯而又纯，绝对地纯。要做到绝对地纯，一切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当然都在批判之列。为使批判更加彻底，就连那些表明了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了的东西，如对山水字画的爱好的爱好，花鸟虫鱼的爱好的爱好，餐桌上的鸡鸭鱼肉，穿戴中的西装革履，生活中的爱情、娱乐，一概因涉嫌背离艰苦朴素的传统而随时有可能被冠以修正主义的恶名。教条主义使艰苦朴素背离了精神的含义而完全现实化为具体的生活模式。在这种形势下，修正主义的内涵与外延都被无限制地扩大了，这决不是某个领袖个人的看法，而是一种社会共识。因此，文革中打倒封资修才那么漫无边际。

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和反动分子则可以具体到个人。地、富、反、坏、右、敌、政、宪、特、警，还有刑事犯罪分子，反革命分子，当然是敌人。为巩固共和国，打击敌对势力、

敌对分子以及刑事犯罪分子当然是正确和必须的，但这一切却严重扩大化了，而且在左倾错误和中国传统的影响下，这些敌对分子的家属、子女、亲戚也受到了株连，失之偏颇。以上大学为例，1963年开始，家庭出身不好或家中有人犯罪、在押的人，上大学就已经很困难了。

阶级斗争的第二种对象是“个人主义”，即“私欲”。源于宗法制政体与小农业、手工业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古代传统，始终把“平均”当作理想社会的最高标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要求平均，就必然要保持一致；要保持一致，个人的喜好偏爱就必然要符合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从孔夫子的“克己复礼”到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都是为着泯灭人的个性，去符合社会伦理道德的规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为富不仁”等古训，都在强调个人私欲的罪恶与为家为国的高尚，都在把物质利益与精神情操对立起来，认为二者水火不相容，冰炭不同炉。这种传统意识在左倾错误与教条主义的影响下并没有消逝，反而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有所膨胀。

一般的人民群众深受这种传统意识的影响。新中国建立之后，他们在政治上真正翻了身，成了国家的主人，再也不受欺侮与冷眼。但他们的经济收入与平均生活水平仍然低于那些经过工商业改造之后的寄生虫——资本家，也低于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心理仍然不平衡。在经济收入与生活水准上，他们在潜意识中仍然要求平均。他们对自己在旧中国遭受的苦难、屈辱记忆犹新，对寄生虫们充满着强烈的不满与憎恨，同时在左倾错误与教条主义的影响下，

对知识分子劳动的特殊性缺乏正确的理解和认识，于是寄生虫们与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衣着打扮、文化素质，都成了新的不平等的体现，都成了新的罪恶之源而必须铲除。这种心理使他们在文革中以支持的态度欣赏着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

基层领导干部既受着传统文化的影响，也亲身感受到了建国初期万众一心搞建设的巨大的现实成就，因而理所当然地认为个人私欲与革命精神的根本对立。在“左”倾错误与教条主义的影响下，个人正常的利益和私欲也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个人主义是平均主义的大敌，要想平均，就必须铲除个人主义。

共和国的开创者们则从另一角度要求铲除个人主义。共和国建国之初的17年，一方面集中国力于一役，迅速建成了一批对国家的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的重点工程，另一方面则是万众一心，团结一致劳动热情与冲天干劲，再加上国力依然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紧迫感、危机感，使得共和国的开创者们格外重视集体的力量，而厌恶个人私欲的膨胀和对物质利益的斤斤计较，锱铢追求。

依靠集体的力量而创造出的巨大的历史成就，使集体主义精神大放光彩。个人主义则是把个人利益绝对化，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是集体主义的大敌，理应受到批判。但“左”倾错误与教条主义却把集体与个人尖锐地对立起来，使个体失去了应有的能动性、创造性、主动性与自主性，进而把公与私的关系程序化、教条化、扩大化，终于走向绝对化。“破私立公”之“私”，已经不只是那个与公相对立、相冲突的个体的私利与私欲，它已包括了个体人生的全部内容。

私的内涵与外延都被任意扩大、夸大了。人只能有阶级情感而不能有个人偏好；只能有远大的无产阶级胸怀而不能有个人的生活情趣；只能胸怀坦荡而不能有个人的秘密与隐私。似乎只要有了后者，就必然不能具有前者。于是，花前月下的柔情蜜意不能有，花鸟虫鱼的爱好不能有，山水书画的迷恋不能有，穿戴打扮的追求也不能有。在“左”倾错误与教条主义眼里，这一切必然地表现为或等同于玩物丧志，沉迷酒色，意志衰退，腐朽没落。人们渐渐失去了个人生活中的与世无害的乐趣和享受，人性本来的七情六欲都被摧毁了。

这种对私的彻底否定，成为检验一个人革命与不革命的试金石。贪图享受、好逸恶劳这一类恶劣品质更被简单地斥责为封、资、修。道德品质问题被无限上纲，成了政治问题，政治标准变成了道德标准，政治批判在基层组织往往就是道德批判；道德标准变成了政治标准，道德批判在基层组织也往往成为政治批判。政治标准一旦成为道德标准，它就必然地要深入到个人生活的一切领域，并对个人生活产生强大的影响力与制约力。道德评价也就因此而成为政治评价——阶级斗争。道德标准一旦成为政治标准，就必然会影响到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于是，绝对平均主义与大锅饭也就成为经天纬地的金科玉律。政治标准道德化，道德标准政治化，其必然结果就是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与绝对化。

对个人情趣、个人爱好与个人选择的压抑，也使得少数人把目光集中于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有些人因企盼而不得，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变成了虐待狂，成为一种社会病态，疯狂地迫害一切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文化地位高于自己的人。他们拉帮结派，打击异己，以此来获取并巩

固自己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

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国，一方面是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大踏步地前进，前程一片光明；一方面也潜伏着左倾错误与教条主义的思想危机。这些危机，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决不会在短期内集中爆发，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坏。如果党的领袖能认识这一点，这些危机便可通过其它方法渐渐消除，因为在共和国的辉煌的胜利面前，人们崇拜党的领袖。但历史终究是历史，历史无法挽回。

文革前中学的思想政治教育

1963年以后，中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这种思想政治教育曾获得了极其巨大的成功，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端，其中有很多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东西。

政治教育主要是党史教育和阶级斗争教育。中学生正处在人生道路中接受新东西、新思想最快，也是最敏感的时期，当时的老三届正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在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与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党史教育使他们强烈地感受到了党的伟大和“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幸福和自豪。

党史教育主要是路线斗争教育和英雄主义、爱国主义教育。路线斗争教育强化着他们的阶级斗争观念，这一点将在下文阶级斗争教育中专门论述，此处不再赘言。

英雄主义教育树立的楷模，主要是战争英雄和建设英雄的形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那些在战争年代大义凛然，慷慨赴死的革命先烈；那些血染疆场，马革裹尸的无畏战士；

那些忍饥受寒，日夜兼程的支前模范……在悲壮的长征路上，在伟大的抗日战争的硝烟中，在壮阔的解放战争的烈火里，那些前辈英雄们用血肉与生命建立的丰功伟业使得中国历史上的一切英雄好汉黯然失色。那些奋战在建设兵团、戈壁大漠、深山密林、雪原海洋中的新中国的建设者们，则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勤劳和汗水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了辉煌的共和国大厦。英雄们用生命和汗水创造的人间奇迹，使中国历史上的一切文化成就相形见绌。老三届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应和着英雄主义的感召。他们渴望着用雪山的清泉、戈壁的狂风去洗涤自己的灵魂，去磨炼自己的意志；渴望着用自己的双手和鲜血去创业，去建功，去迎接那神圣的未来。他们以年轻人特有的热情和激奋幻想着成为新中国未来的栋梁之材。

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则重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尊严，推翻蒋家王朝，建立崭新的人民共和国上。抗击侵略的历史，使他们懂得了如何去维护祖国的尊严，建立共和国的伟业又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优越感与自豪感。这一切在反帝反修的斗争声中，在“帝国主义把在中国复辟的梦想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的警钟声中，在建功立业的渴望中，在献身革命的热情中，化为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路线斗争的教育，则通过党内的路线斗争告诫老三届，斗争是无处不在，永不停息的。“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阶级斗争的教育又在进一步强化着这种斗争的观念。大至两军对垒，小到花鸟虫鱼，无不渗透着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观念。于是，人类的全部文明史就完全浓缩为一部阶

级斗争史，而广泛开展的忆苦思甜活动，则从感情上强化着对阶级斗争的崇拜。

文革前的政治教育的巨大成功，在于它教育出了一代有理想、有热情、有献身精神、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年轻人。他们渴望建功立业，渴望献身革命，渴望马革裹尸，血染疆场，渴望斗争的磨炼与创业的艰辛。他们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领袖，他们相信自己肩负着历史的伟大使命。

它的失误则在于片面地强调斗争的绝对性，把矛盾完全地无保留地纳入阶级斗争的范畴，把一切事物的对立统一都看成是绝对的斗争，把哲学意义上的斗争现实化为生活中的斗争。在这种教条主义的影响下，涉世未深、并不真正理解辩证法的老三届，就很自然地在时代风气的作用下把这种种外在的政治要求内化为世界观、方法论和人生意识。对老三届来说，对立统一规律就是一分为二，一分为二就是矛盾和斗争，而矛盾斗争的本质则毫无疑问地是阶级斗争。

在这种认识基础上形成的逻辑判断，必然地是二值的逻辑判断。人，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事物，不是对的就是错的，不是有用的就是没用的，不是无产阶级的就是封资修的。在绝对的正确与错误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广阔的中间地带中生存的人，都有可能被指斥为“中间派”。而中间派因为不左不右，所以在客观上是帮助反动势力的，是右的。这就是“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红卫兵逻辑”的思想根源。一心要建功立业而又根本不了解社会与人生的老三届，并不因此觉得失去了朋友，反而以唯独自己正确而自豪。这一点，在红卫兵运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在这种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热情有余，冷静不足；干劲有余，智慧不足；斗争精神有余，团结精神不足。他们不会分析、判断较为复杂的事物，他们抱负远大却冲动盲目，他们不了解社会，不了解世界，也不真正了解党的历史，他们渴望在一夜之间决定历史。正因为此，他们在文革中才那么狂热，那么急躁，那么容易被人利用，甚至是自觉自愿地被人利用。也正因为此，他们在理想、幻想、迷狂不能实现时又那么容易消沉。

在前一节中，我们曾谈到在文革前左倾错误思潮与教条主义已在很大程度上把共产主义精神曲解为伦理道德观念，而且更多地体现着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这对老三届的思想教育同样产生着巨大影响。

文革前中学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雷锋精神。它教育老三届要艰苦奋斗，艰苦朴素，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助人为乐，舍己为人，爱憎分明。这种教育确实培养出了老三届关心他人，爱护公物，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嫉恶如仇，见义勇为的优良品格。它的失误不在于对雷锋精神的宣扬与学习，而在于把雷锋精神教条主义化、实用主义化、公式化，忽略了对老三届共产主义人生情操的深层培养。

雷锋精神有“艰苦朴素，艰苦奋斗”，于是吃点好的，穿点好的，养鱼、养花都成了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很多人把新衣服压在箱底，只穿一身“学生蓝”，而且一定要洗得发白，或补丁摞补丁，在某些学校，吃冰棍，喝汽水，都得背着人。

雷锋精神有“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只有“无私”、“忘私”才能“为公”。所以只要有一点个人的要

求，不论其是否合理，都有可能被指责为个人主义。踢球不与他人配合，射门过多，便是“风头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学习刻苦，也极容易被指责为“名利思想”。由于“私”的涵义被无限扩大，男生的理想大都是成为一名边防线上的解放军战士，女生的理想大都是成为一名军垦农场的拖拉机手。似乎只有如此才表明心中无私，只有牺牲个人爱好，兴趣、特长，才能无私。在公与私之间只能有一个选择：非公即私。

雷锋精神有“助人为乐”，“乐于助人”，于是大家都去做“好人好事”，在寻找好人好事有困难的时候，往往把自己的钱拿出来交给老师，声称是捡到的。在一所学校里，丢失的东西远远少于拣到并上交的东西，并非海外奇谈。

雷锋精神有“不怕苦，不怕累”，于是掏厕所就一定要跳入粪坑，劳动就一定要超体力负荷，打扫卫生就一定要弄个浑身泥泞。

雷锋精神有“爱憎分明”，同学之间的小矛盾、小纠纷，就一定要分出个正确与错误，对一般错误的批判也一定要冷若冰霜，严厉“帮助”。

雷锋精神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被教条化、公式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被绝对化为具体形式，但它对老三届思想的形成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影响与作用。

文革前的老三届大都心地坦荡，关心他人，大公无私，爱憎分明，无恶劣习性。他们大都能维护社会秩序，遵守社会公德，敢于同不良现象作斗争。这一切对美化、净化社会心理环境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这种教育因缺乏理论的深度，从而忽略了对老三届人生情操的培养，使得他们不能了